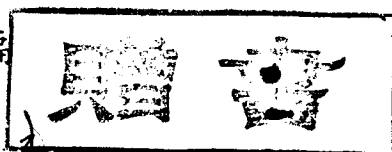


皖江侧畔论三国

——第13届《三国演义》研讨会论文集

赵庆元 主编



校办 张晓春



A0993042

黄山书社

207.413
Z4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皖江侧畔论三国/第13届全国《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合肥:黄山书社,2001.10

ISBN 7-80630-689-7

I. 皖... II. 第... III. 《三国演义》研究-学术会议-文集
IV. I207.4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814 号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298 千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18.00 元

编委会组成人员

主任委员 刘世德

副主任委员 赵庆元 余伯诚

委员 汪大白 齐裕焜 陈辽

沈伯俊 杨建文 余恕诚

胡世厚 谢昭新

主 编 赵庆元

目 录

前 言	沈伯俊(1)
珍视名著	
——对随意性《三国演义》批评的批评	宋培宪(6)
众说纷纭的历史小说	齐裕焜(17)
才出数群 鼎持一足	
——谈安徽在三国时代的地位	冯立鳌 郑荣基(34)
论张辽及其形象的塑造	胡世厚(40)
《三国》中的安徽名人鲁肃	蒋福增(47)
关于鲁肃人物和鲁肃墓的探讨	刘 昆(52)
《罗贯中编次》别解	陈松柏(60)
再谈罗贯中的“有志图王”(提纲)	李灵年(82)
真假虚实说“赤壁”	
——《三国演义》研究	白盾(85)
赤壁战役时间考论	张靖龙(101)
《三国》三题	沈伯俊(120)
嘉靖本、毛本《三国》校读琐议举要	杨建文(127)
《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传统宗族观念	李军均(133)
民间视野话《三国》	王 昊(142)
简论《三国演义》中的“分”与“合”	刘长荣 何兴明(151)
《三国演义》叙事艺术对中国叙事学的贡献	郑铁生(158)
古典小说性格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说	俞晓红(168)
《三国演义》艺术心理探论二则	王海洋(182)
另一种智慧	
——《三国演义》神异叙事风采谈	吴 微(193)
比较:《姑妄言》与《三国演义》	陈 辽(202)
《三国演义》对晚清岭南演义小说创作的影响	

——以黄世仲《洪秀全演义》为例	管 林 余美云(211)
诸葛失策谁与辩	
——《反三国演义》侧论	汪大白(220)
《三国演义》的《临江仙》与《红楼梦》的《好了歌》	喻镇荣(230)
降妖除魔的关圣大帝	
——《鸿魔传》中的关羽形象	张弦生(236)
儒学的尴尬与作者的无奈	
——《三国演义》儒家文化底蕴探析	刘玉玲(242)
罗贯中笔下的道教先驱者	
——《三国演义》与道教文化研究之一	熊 鸷(250)
巧借术数施妙手	
——论《三国演义》中的术数描写	卫绍生(264)
《三国演义》中的酒文化	郭平凡(274)
《三国演义》与领导心理学	
——从诸葛亮的领导活动谈起	赵庆元(278)
《三国演义》与“法”	张晓春(293)
《三国演义》孤独者形象及其审美意义	余 丹(306)
漫说张飞的性格	胥惠民(316)
论庞统形象及其意义	欧阳代发(323)
诸葛亮——古代士人理想人格的最优化	黄海兵(331)
文史对照话孔明	张淑蓉(343)
庞统——充满悲剧色彩的智慧之星	高显齐 刘自力(351)
乱世中的边缘人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谯周形象	李庆霞(355)
浅析罗贯中笔下《三国演义》中的晋人形象	
.....	范光耀 刘永成(369)
后记	编者(374)

第十三届《三国演义》研讨会论文集

前 言

沈伯俊

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山高等专科学校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2000年5月9日至12日在安徽芜湖举行。来自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的70名学者和1名新加坡学者出席了这次世纪交替之际的重要会议。在主办单位和与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本届研讨会发扬了团结、和谐的会风和实事求是、平等交流的学风,取得了圆满成功,在《三国演义》研究史上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

综观本届研讨会的论文,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对研究资料有新的发掘和考辨。关于罗贯中的生平事迹,史料甚少而后人见解歧异。李灵年的《再谈罗贯中“有志图王”》一文,虽仅为提纲,却颇有值得注意的见解。文章提出了四个问题:其一,“文献记载的可信性”。认为明代王圻《稗史汇编》所记罗贯中“有志图王”一语,必有所据;查其所记元末王昆等13人小传,皆为其耳闻目睹之事,便可得知。而罗贯中元末生活在张士诚所占据的江浙一带,其入张士诚幕府的传闻似应非虚。其二,“罗贯中‘图王’的涵义”;其三,“罗氏‘图王’失败后的悲哀及其寄托”;其四,“对‘竟不知所终’的猜测”。关于《三国演义》重点描写的赤壁之战,《三国》研究界很少有人推敲其发生时间,张靖龙的《赤壁战役时间考论》则对有关史料作了追本溯源的考辨,认为赤壁之战

发生于建安十三年十二月。首先,抓住战役进行时“盛寒”的季节特点,根据《中华两千年历书》,指出建安十三年“闰十二月”的事实,并据《后汉书朔闰表》所记“建安十三年……闰十二月壬子朔。大寒辛亥在十二月晦日”,证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袁宏《后汉纪》关于赤壁之战发生于年十二月的记载是正确的。其次,在有关汉末三国的史籍中,陈寿《三国志》最早,其史料的可靠性也最高。而就陈寿著书的体例来看,将《武帝纪》与《先主传》、《吴主传》相比较,关于赤壁之战发生时间的记载也应以《武帝纪》为准。文章对史料的爬梳颇见功力,对三国史和《三国演义》研究都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第二,研究范围有新的开拓,视角有新的变化。在比较研究方面,陈辽的《比较:〈姑妄言〉与〈三国演义〉》,大概是有关这一论题的第一篇论文。文章不从“艳情小说”的一般视角观照《姑妄言》,而将其与《三国演义》加以比较,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三国演义》对《姑妄言》的明显影响,并指出了《姑妄言》在军事文学方面与《三国演义》的差距,证明《三国演义》之后的明清两代任何军事文学作品都不能不接受《三国》的影响。这些论述,颇能新人耳目。在视角的选择上,许多学者着力求新。熊笃的《罗贯中笔下的道教先驱者》,对《三国演义》与道教文化的关系作了很有意义的探讨。卫绍生的《巧借术数施妙手》,概述了《三国演义》中有关占星、占梦等术数的描写,指出此类描写并非由于作者有意宣扬术数,而是为了强化和突出天命与天意,设置悬念,增加情节发展的变数,增强情节的神秘性和可读性。吴微的《另一种智慧——〈三国演义〉神异叙事风采谈》,则透视了《演义》神异叙事的艺术功能:其一,潜隐结构的点醒者;其二,时空穿梭的驾驭者;其三,神秘意象的生发者。罗贯中以其独具神采的神异叙事,造就了深契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审美境界,使得一系列的人物形象超越了其本身的能量,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从这一角度看,《三国演义》形成了中国

小说创作神异叙事的一种范型,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另一种叙事智慧。这样的论述,对作品的内容和写法都有新的发现。王昊的《民间视野话〈三国〉》,从“世代累积看主题”、“智勇兼备显意趣”、“直探心源去伪饰”、“情感缺失须补偿”、“应用方解其中味”五个方面考察了民间对《三国演义》的接受与阐释,指出关注民间视野的评价,有利于开拓《三国演义》的研究领域。这一见解,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第三,对小说理论有新的阐发。《三国演义》研究的深入,迫切需要对有关的小说理论研究的深入。本届研讨会上,一些论文在这方面作了值得赞许的努力。齐裕焜的《众说纷纭的历史小说》,回顾了从古代到现代关于历史小说的性质和创作原则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历史小说是文学的一种,它应当遵循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包括艺术虚构、人物典型化原则等。(2)历史与历史小说的关系是生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历史小说是取材于历史的小说,这是它与一般小说不同的个性。(3)历史小说对历史有一定的依存关系,因此,作品中主要的历史事件和主要人物应有史实的依据,作品中的文化心理、社会风尚、生活细节应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4)在主要人物和事件不违背历史的前提下,对历史进行总体的审美把握,遵循艺术规律进行创作。文章由此认为,《三国演义》至今仍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典范。郑铁生的《〈三国演义〉叙事艺术对中国叙事学的贡献》,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坚持主体性原则,概括了《三国演义》对构建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的意义:(1)将文学叙事从历史叙事中剥离出来,在文体上取得了独立的意义。(2)形成了文学叙事的基本特征——时间艺术空间化。(3)小说家对叙事的时空机制实行有效的控制和调度,成功地建立起作品的审美时空形态。在这一领域,作者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俞晓红的《古典小说性格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论》,针对“从类型化典型走向个性化典型”的流行说法,就“古典主义”、“典型化”、“个性

化”等概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辨析,认为中国小说史上并不存在“古典主义”的理论纲领和创作实践,以往对“典型化”、“个性化”概念的理解往往模糊不清;时代风气和民族文化背景,都决定了《三国演义》不可能像西方古典主义戏剧那样,成为和谐静穆的类型化典型的范本。这些见解,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王海洋的《三国演义艺术心理探论二则》从艺术心理学角度对小说的创作动机和形象范式问题作了一定探索,观点也较为新异。

第四,在应用研究上有新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我曾经提出:

所谓“应用研究”,就是超出纯文学研究的范畴,把《三国演义》当作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结晶,当作人生的启示录,从应用科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我认为,应用研究与本体研究各有其价值,可以并行不悖。恢弘的气度,开放的眼光,多维多向的视角,将使《三国演义》这部巨著焕发出新的光彩^①。

在本届研讨会的论文中,赵庆元的《〈三国演义〉与领导心理学——从诸葛亮的领导活动谈起》,堪称应用研究的一篇力作。文章认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研究领导者心理规律不可多得的标本。他遵从自爱自强的人生准则,具有重和重德的善美观念,具有“天人合一”理论的遵从倾向、以常反常的领导艺术和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小说中的管理思想和领导心理学内容,能使人领略古代管理文化的苍劲与淳朴,体验古老文明活动的悠久与蓬勃,感悟古代学者智慧的深邃与高远。如此论述,颇有深度,确能予人启迪。

第五,对《三国演义》的地位和影响有新的研讨。管林、余美云的《〈三国演义〉对晚清岭南演义小说创作的影响》,以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为例,从布局安排、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语言运用、战争描写等方面分析了《三国演义》对《洪秀全演义》的影响,指出:“《三

国演义》对晚清岭南演义体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明显而全面的。它不愧为我国小说史上的一座丰碑,不愧为我国演义体小说的楷模。”

此外,汪大白的《诸葛失策谁与辩——〈反三国志演义〉侧论》、石麟的《关羽三题》等文章,也各具特色。

本届研究会还有一点令人高兴的,就是发现了一批有实力的青年研究者。像安徽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李庆霞、余丹,湖北大学的研究生李军均,其论文从选题到论述都颇有特色。新生力量的成长,乃是《三国演义》研究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标志。

当然,本届研讨会也有一些薄弱环节。比较明显的有两点:一是不少文章、包括一些选题较好的文章,研究的深度尚感不足。二是会议原定的议题之一“《三国演义》与安徽”,本来很有价值,可惜这方面的论文仅见胡世厚的《论张辽及其艺术形象的创造》、蒋福增的《“三国”中的安徽名人鲁肃》、刘昆的《关于鲁肃和鲁肃墓的探讨》等4篇。看来,今后还应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

为了办好这次研讨会,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山高等专科学校的同志们做了大量的、周密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还应指出的是,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赵庆元先生,为筹备本届研讨会,前后努力达数年之久;为了会议文集的出版,他又不辞辛劳,多方奔走。为此,我也要向庆元表示诚挚的谢意!

注 释:

- ①见拙作《90年代:〈三国演义〉文化价值重放异彩》,载1990年12月30日《社会科学报》。

珍 视 名 著

——对随意性《三国演义》批评的批评

宋培宪

最近一段时间,笔者连续读了几部专门指顾评议或附带涉及评说《三国演义》的著作(一为《青梅煮酒》,二为《说三道四》,三为《大江东去》)^①,阅后固是受益良多,但也发现其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过程中的随意性倾向,为保卫古典文学名著应有的尊严,现不避唐突,对上举著作中如下三个方面的欠妥与错谬三处,特提出如下批评意见。

一、故弄玄虚的词句

《青梅煮酒》一书中列有“千古云长”一节,是专门评议关羽其人的,第100页中写有这样一段文字:

欧美人看《三个王朝的罗曼史》(按即《三国演义》英译名),大概会怀疑关羽是否有同性恋倾向,根据彼邦的《麻衣相法》,他们还可能把关羽那把大胡须,进一步鉴定为同性恋的标准特征。我得说这是冤枉的,不是说非同性恋者就不该成为美髯公,也不是说同性恋有何丢脸之处,而是关云长根本就不是同性恋。都怪罗贯中不好,他为什么把书写得让人误以为关羽是个老童男呢?

且不谈作者对同性恋的看法是否允当,也勿论在议及古典小说中人物(同时也是历史人物)的关羽是怎么就与同性恋挂上了钩,只是面对这一段左右回环的“妙文”,我们不仅要问:究竟是谁“误以

为关羽是个老童男”了呢？所谓欧美人“大概会”、“可能把”之类，既然只是一种推测或假设，那么，作者之所云“关云长根本就不是同性恋”辩护不是无的放矢吗？再往后读，我们便会发现，倒是作者本人颇有这样看法之嫌。因为在该书的第184页中，作者还曾幻想过最好能有一艘时间潜艇，将三国好汉运抵当今，让他们读《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看同名的电视连续剧。我们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作者的想象丰富，其竟有如下一段绝胜于“哥德巴赫”的猜想：“关羽，这个极度自负的美髯将军一边暗叫惭愧，一边寻思着该给罗贯中老弟送上点东西意思意思，虽然一出门就受到当代同性恋者的追逐”。真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矣。

而在论及袁绍谋士沮授时，作者又曾这样写道：“沮授，姓氏已在字面上露出某种不祥，命运的淹蹇可悲，便多少得到了暗示”（第173—174页）。面对如此文句，笔者乃大惑：难道“姓氏”本身竟是可以露出“祥”或“不祥”来的吗？如果说在有些小说中，作者为其笔下的人物命名时也许会有寓意或暗示的话，那么，历史上实有其人^②的沮授的命运与其“姓氏”之间能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照此推理，既然姓“沮”的会“不祥”，那姓“吉”的定会事事如意，姓“钱”的则个个腰缠万贯了？

接下来，作者在叙述过沮授的一系列妙计良谋均遭袁绍拒绝，以致于在袁绍战败，沮授也成了俘虏后，说：“爱才的曹操，可说是给足了沮授面子”，但身为阶下囚的沮授却并不买帐，“后来为曹操所杀，乃是因为他执意逃奔袁绍，结果被曹操手下抓住”。在剖析沮授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时作者认为，“仅据‘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是无法解释沮授行为的”，理由是：“袁绍起先虽曾对沮授颇为信任，但最终的行为，应已可使沮授寒心了”。然则，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沮授决不降曹而誓死追随袁绍的呢？作者竟令人惊诧地归结出如下一段“奇文”：

沮授大概是爱上袁绍了吧？中国古人历来对“男风”

设禁松驰,而相貌堂堂的袁绍,至少在仪表风度上,还是极具煽情性的。

联系起来看,什么“同性恋”了、“男风”了等等,读着这些词句,很容易让人怀疑作者是否即是一位专门研究“异常性意识”与“变态性行为”的医学工作者乃至专家?不然的话,评说起文学形象来,怎会动辄便与此类东西牵连得这般密切?不客气地讲,这些个看似颇具“现代意识”或曰“前卫思维”的所谓评论,并无任何道理可言,所具有者,只不过是故弄玄虚而已。

二、存在争议的论点

首先需做个说明,即《青梅煮酒》乃是以“长河”而名之的“文化随笔丛书”之一种。既曰“文化随笔”,当然要于“文化”和“学术”的框架内“在所涉足的领域里继往开来,或是提出某些独立的具有建设意义的见解”,该丛书主编在“总序”中的这番识见与主旨应当说是正确的。而这册以三国时代诸多人物为指顾评议对象的著作,在不少的地方,却颇似该书“自序”中所云:“我的特权是想象”,“我的手段常常就是不择手段”,“这样,我不得不站在与罗贯中截然相反的立场上,并且识趣地只在罗氏兴趣不大的领域,插上自己那一杠子”,不过,作者的这“一杠子”,常常就“插”出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譬如,围绕着《演义》一书对于曹操形象的塑造,作者一方面认为罗贯中“尽可能充分地将已有材料加以挖掘组合”,同时又认为“罗贯中与其说艺术地再现了曹操,毋宁说乃是曹操劣行败迹的传述者和集大成者”(第189页),其理由则在于:“罗贯中写曹操多事出有因而通常又非真凭实据”。在这里,作者显然步入了许多论者所曾步入过的这样一个怪圈:即,一方面明鉴史书与小说的畛畔与区别,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将两者混为一谈。作者在此问题上比1959年初力倡为曹操翻案的历史家们高明的地方,只是没有借以全盘否定《三国演义》。但紧承上文、第190页的如下一段文辞,

却又让人匪夷所思：

而当小说干犯了历史，追求名留青史的曹操也就只能沦为谈笑中人、戏曲中人。为曹操翻案之所以难以成功，并非当年郭沫若、翦伯赞等人呐喊不力，事实上是由于吾人不忍失去这么一位任人奚落的对象。由此我们可见所谓“时间是最公正的”这一陈述的苍白和不可尽信。

“干犯”者，“冒犯、冲犯”之谓也。作者于此处选用该词，显然是对“小说每常演历史为说部”之现象颇有微辞的又一证明，——因为在该书的第187页里，作者就曾写有这样一段话：“当小说家一面要捍卫虚构的特权，一面又不愿对历史题材割爱时，神圣历史的马其诺防线只能接受崩溃的结局，不复有尊严可言。”那么，神圣历史的尊严丢失在什么地方了呢？答曰：“历史本身的尊严便被置诸小说的法则之下，成为小说家厨房里聊供烹饪之需的鸡鸭鱼肉”了。在作者看来，“历史的小说化乃历史的变节”，而“历史小说”实乃“小说化历史”，也正因此，方才使得本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曹操“沦为谈笑中人、戏曲中人”。作者一方面为曹操大鸣其“冤”，另一方面则将曹操之“冤”归结为“事实上是由于吾人不忍失去这么一位任人奚落的对象。”这就在事实上不仅牵涉到哪一个或哪几个人，而且成为关联到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的问题了！说得刻薄一点，此种论点恐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诮。客观情形是，“历史”指的是业已过去了的实际发生过的事实，历史学是一种研究历史的科学；而小说，纵然是一定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表现对象的历史小说，也是完全可以在不违背历史本质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大胆虚构的，它属于文学的范畴。二者实分属不同的门类与领域，并各自具有着独特的判断标准和运作规范。因此，1959年初春史学界一些专家所发动的那场“为曹操翻案”的风潮，才并未得到文学界的普遍认同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只能不了了之，而绝非是如作者所归结的那样：“事实是由于吾人不忍失

去这么一位任人奚落的对象。”果如许，“吾人”岂不是太好“奚落”他人，并乐此不疲到连是非曲直都可以浑然不顾的程度了吗？质言之，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学形象”与“历史人物”不相统属的问题。归根结蒂，文学作品中的曹操实无案可翻！关于那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个中过节，笔者曾有一篇长文予以专论^③，感兴趣的朋友自不妨查阅过目，此处不赘。

《说三道四》为“小说家散文丛书”之一。或许是由于此乃“小说家散文”的缘故，其立论方面的信马由缰似乎更加漫无边际。且看该书第2页中如下一段文字：

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一本权谋教科书的话，那么，这种“结义”手段，就是此书的第一个权谋。“千古佳话”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外包装罢了。古往今来，所有的卑鄙的和不那么卑鄙的，以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都会披上一件漂亮的外衣。

这开篇第一节“拜把子的背后”中的上述言词所表露出来的看法就颇值得讨论。我们说，在《三国演义》中固然展示出许许多多施计用谋、展现策略运用的事例，但若径直地将其认定为“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一本权谋教科书”，则未必贴切。因为，“权谋”一词，虽然可解为“谋略”或“计谋”，然在最通常的意义上，却指的是“权术、阴谋”^④，《荀子·王霸》有云：“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便正是用的这一原始义项。以“权”字为主所组成的词语，如“权人”谓权变诈伪之人，“权诈”乃权谋、诈术之意，“权诡”作权诈诡辩解，“权谲”的意思是权谋诡诈，等等，也无不具有诈伪、欺瞒和耍手腕的贬义成份。而联系上引文字的具体语境来看，作者之意与此相类。这就不得不使我们要做如下的反问：难道说《三国演义》主要是一部教导人们搞阴谋诡计的著作吗？此其一；其二，如果不能就这一反问做出肯定性地回答，那么，所谓“这种‘结义’手段，就是此书的第一个权谋”的说法，当然就是站不住

脚的！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动荡岁月，而且身份又是如此低微卑下的刘（织席贩屦）、关（杀人亡命）、张（屠猪沽酒），出于相互援引以图照应、或彼此联手意欲有所作为的需要而“拜把子”，难道说他们连这点“虽然异姓”、却愿“结为兄弟”的权利都不配有吗？须知，当时他们并非是衣食无忧的“贵人”，也无暇、无心或者说无条件、无本钱做那种“有闲阶级”所常常捣弄的冠冕堂皇的“外包装”。所以，自然也就不会为着“卑鄙的和不那么卑鄙的”“个人目的”而去“披上一件漂亮的外衣”！

三、知识的错误

让我们回到《青梅煮酒》，再看一看第68页中作者讨论祢衡的一段文字：

祢衡天生是要骂尽世人的，和后世阮籍准备一副青白眼的处世态度不同，祢衡从不知世上有谁值得他青眼相加，所以一概报之以白眼。即使对人间仅有的两位知己孔融和杨修，评价起来照样痴痴癫癫，没遮没拦，竟将年长自己二十岁的孔融称为“大儿子”，将杨修称为“小儿子”。我们发现，世人一旦落入祢衡的嘴里，其结果甚至比羊落虎口还要凄惨。

平心而论，祢衡确实具有“尚气刚傲，好娇时慢物”的特点，并忒好讥讽、谩骂他人，“击鼓骂曹”便正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绝好例证。但若说他“竟将年长自己二十岁的孔融称为‘大儿子’，将杨修称为‘小儿子’”，则大错而特错！

祢衡之所云“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不仅小说上这样写了，而且史载凿凿。但此称绝无轻蔑之意，如果说内里多少含有点调侃成分的话，那也仅仅是通过这种独特的调侃更切切实实地表达出祢衡对两位知己的称许之情。倒是作者本人因未能细研有关文献，并想当然地望文生义，从而导致了“大儿”、“小儿”两个语